

O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UNTRIES ORIGINALLY WITH PLANNED ECONOMY

辽宁大学出版社

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评论



程伟 / 著

程伟/著

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评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评论/程伟著.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11

ISBN 7-5610-3911-5

I. 计… II. 程… III.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IV. F1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7957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410 千字 印张: 16.5 插页: 8

印数: 1-3000 册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文禄

责任校对: 李 佳

祝恩民

封面设计: 邹本忠

定价: 30.00 元

作者的话

在即将被载入人类史册的 20 世纪中，计划经济体制几乎经历了百年沧桑。

从源头看，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是一对孪生姐妹。1917 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之，不仅计划经济体制应运而生，而且，“社会主义 = 计划经济”，或者倒过来，“计划经济 = 社会主义”，在逻辑上被公式化，在理念上被政治化，在模式上被神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原苏联是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只是在一个“点”上。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迅猛地由“点”延长成“线”，再拓展成“片”，于是，计划

经济体制运作的空间骤然放大。

然而，“否定之否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开始，原苏东国家先后走上了体制转轨的道路。遗憾的是，在 30 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主要是由于理论创新的严重滞后，原苏东国家的体制转轨始终未能实现实质性的突破。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先是东欧剧变，紧接着，苏联解体。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给这些国家以往失败的转轨记录画上了句号，也从此掀开了这些国家体制转轨的新的一页。

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比原苏东国家晚了大约 20 年，这是中国的不幸。而幸运的是，中国的体制转轨，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值得汲取的教训。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中国又注重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性地开拓与深入。其结果是，虽然中国的体制转轨启动较晚，但目标明确，路径清晰，操作平稳，成就显著。

传统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的实践有差异，有的遭遇较大的挫折，有的比较成功，这是不同点。共同点是，它们无一例外地继续处在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这是一项面向 21 世纪的长期工程，任重道远。时值世纪之交，回眸过去，梳理历史遗产，进而服务于未来，是大有裨益的。

80年代初，我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并始终把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的理论与实践作为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将近20年过去了，现在我把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汇集成书，献给读者。收入本书的论文共计42篇，分成四个部分，按发表的时序排列，在文后标注原载处。论文保持其原貌，只是个别行文略有改动。

为了方便读者把握本书的基本框架和总体脉络，我对每部分阐述的主要问题分别作梗概的归纳。

第一部分，苏俄篇，包括16篇论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剖析斯大林时期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我认为，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原苏联形成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最主要的根源在于理论。因此，我撰写了1.12和1.13两文，前者纵向评介列宁思想认识的主要变化，后者横向概述斯大林、布哈林之间的原则分歧，进而把计划经济体制原始雏形的理论背景浓缩地反映出来。在此基础上，文章1.14对计划经济体制在原苏联的形成以及数十年的延续，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揭示出五大成因：1. 历史条件与经济发展战略；2. 理论认识的偏见与局限；3. 外部环境与争霸世界的野心；4. 潜在的民族矛盾；5. 政治缘由。

二是对勃列日涅夫时代原苏联的体制转轨进行评介。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 18 年（1964～1982 年），期间，原苏联在经济改革、体制转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有成绩，但问题是主要的，总体上是失败的。当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国拉开改革帷幕的时候，了解原苏联已有的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使我们的事业避免走弯路，显得十分重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撰写并发表了 1.1～1.5 这五篇很有针对性的论文。其中的前两文，运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作总体性评介。一方面，我对其改革的举措及转轨的绩效给予了低调处理；另一方面，我也不同意国内学术界一度广为盛行的“南斯拉夫、匈牙利的经济模式比苏联的好”的观点。我在论文 1.2 中明确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客观情况，国情的不同，决定了在经济模式上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一定的模式对这个国家是适用的，对那个国家则不一定也适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对每个国家来说都适用的经济模式。”其中的后三文，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原苏联某些单项改革的评介。这里，我不仅依据大量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较为系统、准确地介绍了原苏联在价格、财政、金融等领域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而且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

主张。举两个例子：之一，在文章 1.3 的第三部分，我对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条件下如何协调价格与财政的关系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略），当时曾经引起国内学术界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之二，在文章 1.4 和 1.5 中，通过多层面的分析与论证，我提出“信贷究竟是从属于财政的范畴还是独立的经济范畴，绝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正确处理银行与财政部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与实践密切相关的意义。”我主张，计划经济国家实施体制转轨，有必要在隶属关系上尽早地将银行机构与财政部门彻底脱钩。

三是分析和总结戈尔巴乔夫时期原苏联体制转轨受挫的历史教训。1985 年 3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原苏联第八位最高领导人。起初，国内外对他普遍看好，也对他所领导的国家较有信心。可是，势态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其结果众所周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为解开这个谜做出过认真的努力。首先，文章 1.7 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原苏联体制转轨的进程、目标、路径、措施以及前景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接下来，在 1.8 和 1.9 两文中，我以翔实的资料和亲身的感受为基础，着重分析了其体制转轨严重受挫的主要缘由，同时，总结出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若干历史教训。最后，1.10 一文还对原苏联

的经济走势及其在国际范围内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预测。

四是以 1.11、1.15 和 1.16 三文，审视苏联解体后“独联体”的命运，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以及俄罗斯体制转轨的绩效。其中的 1.16 一文是代表作，围绕俄罗斯的转轨问题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议论，在我国学术界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响。举一个例子。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实施激进转轨是根本错误的。我率先提出与之大相径庭的观点，以递进的研究方法得出三个新的研究结论：之一，俄罗斯经济转轨采用激进的方式，并非注定就是错误；之二，俄罗斯经济转轨启用激进方式，即使是不合适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之三，俄罗斯经济转轨摒弃激进方式，是合情合理的正常现象。

第二部分，东欧篇，由 7 篇论文构成，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东欧国家的技术改造。80 年代，对企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成为我国经济工作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期间，我发表了 2.1、2.2 和 2.3 三文，把东欧国家技术改造重要方面的基本做法介绍过来，既肯定了经验，也指出了问题，目的是“洋为中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东欧国家改革的理论与实

践。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奈，是三位著名的东欧学者，他们的理论对于东欧甚至其他计划经济国家改革、转轨的实践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2.4 一文对这三位学者的理论实质、政策主张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评介，对他们作出的理论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指出了他们的理论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2.5 和 2.6 两文，则主要从实践的角度，分别反思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体制转轨未获成功的沉痛教训。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东欧加入欧盟的前景及其影响。东欧剧变后脱离了原苏联的势力范围，它向何处去？能否加入欧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度备受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发表了 2.7 一文，略陈管见。

第三部分，中国篇，共 9 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计划经济国家改革、转轨的若干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这集中地反映在 3.1 一文中，主要见解是：1. 开创自己的经济模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照搬他人是没有出路的；2. 改革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不断深化的过程；3. 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4. 建立起新的宏观调控机制，是改革的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任

务。

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完全正确的。3.2 和 3.3 两文，一方面剖析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源，指出：“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上的失败；而经济上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上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在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全部内容的主线。”

三是通过撰写 3.4 和 3.8 两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与格局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例如，我率先提出，战后初期形成的“两极”格局，其实体是以美苏各自为首的、以社会制度划分的两大国家集团，只是到了 70 年代中期，才演变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还如，我明确提出，“冷战”结束后我国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实际是挑战大于机遇。形成这种认识，一是因为有事实根据（略），二是有助于我们增强紧迫感，甚至危机感，从而切实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再如，面对“和平与发展”取代“冷战”这一新的形势，90 年代初我就力主加快国有企业、尤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事实上乃是‘三资’企业、农村企业、乡

镇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等生力军。今后我国经济上速度、上质量，特别是跻身于竞争明显加剧的国际市场，必须着力启动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一主力部队。在笔者看来，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彻底转换之时，就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形成之日。”

四是关于辽宁经济问题，主要是关于辽宁的外向牵动战略问题。3.5 一文在综观世界范围内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将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五化”，即：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化，产业结构的国际对接中心化，生产要素流动的全球化，企业经营的跨国化，经济运行机制的自由化。并对实施外向牵动战略过程中的“借鉴与创新”、“隐患与防范”问题发表了看法。3.7 一文则侧重研究辽宁外向牵动战略的重心定位和切入点。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始料不及的强烈反响，有数十份刊物来函要求收录或者转载。

第四部分，外文篇，包括 10 篇论文，其中 7 篇用俄文发表，2 篇用英文发表，1 篇用日文发表。

使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4.1 和 4.2 两文发表在原苏联金融界最权威刊物《货币与信用》杂志上。该杂志 1927 年创刊，我是在该杂志发表文章的第一个中国人。4.4 一文发表在原苏联财政界最权威刊物《苏联财政》杂志上，1926 年创刊。据

说，在我之前，只有一、两个中国人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本书即将出版。此时此刻，我对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著名专家，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我的导师冯舜华教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导师的治学态度，研究问题的方法，学术思想和风格，教会了我怎样做学问。跟着她，我还学会了怎样做人。此时此刻，我还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国外的导师，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 O·И·拉夫鲁申教授。他在学术以及俄文写作方面对我的悉心指导，使我获益匪浅。

在出版本书的过程中，辽宁大学出版社李文禄社长，编辑祝恩民，以及美编邹本忠等同志，付出了不少辛苦。在此，谨表谢意。

程伟

1999 年 10 月 20 日

作者简介

程伟，男，汉族，1954年1月12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校长。

1976年9月毕业于辽宁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留校任教。1979年9月考入本校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读研究生，1982年9月毕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再度留校任教后，于1983年10月晋升为讲师。1986年10月，经国家统一考试遴选，由原国家教委派出，赴原苏联“莫斯科财政金融学院”（苏联解体后更名为“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留学，留学期间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常务副主席，1990年7月完成学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回国后，重返辽宁大学执教，1991年1月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10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2年3月至1995年2月，任辽宁大学国际经济

学院副院长。1995年3月至1999年3月，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从1999年4月起，任辽宁大学校长。

20多年来，始终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主讲《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比较经济体制学》、《外国经济管理》、《国际经济学》等多门课程，有的专业课程直接用外语讲授。科研领域，在广泛研究世界经济学科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的同时，较早地把研究方向明确定位于原苏东国家亦即现在的东欧、独联体（尤其是原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国家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方面。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自撰或主编专著6部，主持国家级研究项目3项，省部级研究项目4项，10余项研究成果获奖。

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东欧中亚学会理事、辽宁省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国际经济法学会副理事长、沈阳市中青年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沈阳市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团体领导职务。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辽宁省政府特邀研究员。荣获“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辽宁省跨世纪拔尖人才”、“辽宁省优秀青年科学技术专家”、“辽宁省跨世纪杰出中华英才”、“沈阳市优秀专家”、“沈阳市优秀教育工作者”、“沈阳市主人翁楷模”等称号。



作者近照



O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UNTRIES ORIGINALLY WITH PLANNED ECONOMY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沈阳